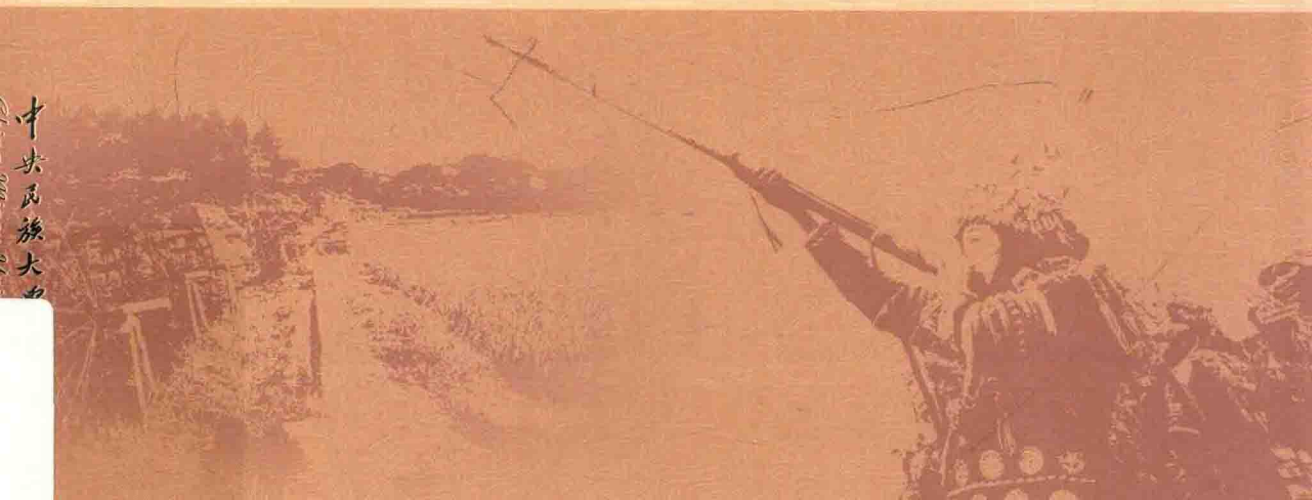


黔东南

QIANDONGNAN
FANGYAN DILIXUE YANJIU

方言地理学研究

◎ 王贵生 张雄等著



『黔东南民族接触地区汉语方言地理学调查及应用研究』
教育部社科一般项目（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课题（10XJZ40008）

黔东南

QIANDONGNAN
FANGYAN DILIXUE YANJIU

方言地理学研究

◎ 王贵生 张雄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黔东南方言地理学研究/王贵生, 张雄等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660-0875-6

I. ①黔… II. ①王… ②张… III. ①西南官话—地理语言学—研究—贵州省
IV. ①H17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407 号

黔东南方言地理学研究

著 者 王贵生 张 雄等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彩页: 3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875-6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黔东南的全称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通过这一行政区划的命名我们大致就可了解这一地区所属区域文化的特殊性。首先，这里地处贵州省的东南角，属于川、滇、鄂、湘、桂五省区交界的过渡地带，历史上，不同地方势力的扩张渗透不仅导致这一地区行政沿革的错综纠结，而且也使这一地区的所属文化呈现多样丰富的特征。其次，这里属于以苗族、侗族聚居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古苗疆”民族文化的千年积淀以及由民族融合构成的近代历史进程，使这一地区多元融合的文化基色当中又增加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色，多元文化综合叠加决定了这一地区现代汉语方言多样杂陈的基本面貌。历史上，有关“黔东南方言”的研究曾涉及两种不同的地域概念：1. 泛指贵州省的东南部，我国传统的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研究大多取这一定义。2. 特指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汉语方言，取这一定义的大多为黔东南或贵州的本土学者及相关研究。本课题的研究属于后者，为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范围内的现代汉语方言研究。

我国传统以字音为主、遵循广韵体系来显示方言层次的描写方言学，是引导我们进入相关研究的入门基础，我们此前曾组织过《黔东南方言志》的编撰，正是黔东南所属16个县市方言点的前期调查基础，才使我们有了对黔东南方言共时现状的初步了解。以此作为基础，而在“单点方言—广韵音系—现代共同语”的“大三角”比较研究中，我们的视野又开始深入黔东南方言历时比较的研究阶段。而在汇聚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上，主要以西南官话分区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则为我们课题的深入奠定了重要基础。有关研究主要以方言所属的语音系统作为判断标准，在方言分区“小片”的划分中，历史上不同的学者曾根据不同的调查结果对具体到黔东南自治州一地的所属方言提出过“二分”、“三分”、“四分”等不同的分区处理意见。而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还需进一步地“五分”，即按照不同方言的声调类型，进一步将黔东南的所属方言分为“镇远方言”、“黎平方言”、“黄平方言”、“凯里方言”和“丹寨方言”五个“小片”。我们认为这样小区划分的认识基础：第一，这是尊重方言持有人意见的结果，因为“五分”就是黔东南人仅凭听觉就能加以区别的一种方言分类；第二，这是可与黔东南行政区划沿革历史对应起来的一种分区处理办法；第三，由“二分”、“三分”、“四分”到“五分”，分区的不断细化也是此前学者研究的发展趋势，我们的最终处理大致就是建立在充分借鉴省内外学者意见基础上的结果；第四，也许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最终的处理方案同时还是综合考虑了黔东南特殊的自然地理、民族分布、移民历史等背景因素而做出的判断。

在方言地理学的视野里，自然地理背景对于黔东南所属文化以及不同区域文化分歧

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虽然我们反对机械的环境决定论,但地理因素同样也是唯物论者关注的领域。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而马克思认为地理环境就是“人化了的自然界”,认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①。恩格斯也说,“内地,特别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②。这些论述具体到黔东南方言的分区背景以及黔东南方言所赖以生成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认识,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黔东南以高崖深箐为基本特征的山形水势,决定了这一地区历史沿革以及区划版图的形成。首先,山西向东绵延的苗岭高原构成了黔东南基本的地貌骨架,而苗岭东缘的台面落差则构成了黔、湘两省的天然划界;黔东南的南部又有九万大山山系,而以月亮山为代表的海拔千米以上的系列高山构成了黔、桂两省区的天然区隔;而在北部和西部,武陵山系、苗岭山系隆起的高山也同样将黔东南紧紧地围绕在特定的地质环境当中。具体到自治州的区域范围内,三大山系由北向南的层层区隔之间则又各自分割出了舞阳河流域、清水江流域、洪州河流域以及都柳江流域等不同的生态空间,高山陡崖、大河深谷等天堑的层层阻碍,不同的生态区域之间则又成为不同文化类型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只有着眼于这样一种地理因素背景的深入观察,我们对于黔东南不同汉语方言差异性的形成原因才会具有一种可以落到实处的人文空间认识。

方言地理学还特别关注方言所属地区历史沿革的社会背景。乾隆《贵州通志》曾这样概括明代以前的贵州:“黔为边徼,三代前未入版图。逮汉设郡县,初有人治,而书缺有,间传者寥寥。五胡之乱,复沦蛮族。唐宋仅有空名,羁縻而已。元虽设宣慰司,尚无流官。明清两代,辟为省治,移风易俗,官斯土者,循良继轨,粲然可观。”这段话言简意赅,其中的几个关键点特别值得关注:后世所称的贵州,唐宋以前“仅有空名”,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沿革还无从谈起。元代虽无流官,但土司行政至少也将这块曾经的“苗疆生界”带入了主流视线并在古代文献中留下了最初的记载。明初贵州建省“辟为省治”,现代行政沿革意义上的“贵州”,包括本课题视野内的“黔东南”才真正开始了近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这样一种历史定位十分重要,因此可以做出的基本判断就是:黔东南所属地区的汉语方言应该就是在元、明以后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为“古代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贵州人这个概念,只有生息在贵州高原境内的夜郎人、牂柯人、播州人、湖广人、云南人、巴人、蜀人等等”^③,因此直至明初始有汉人大量进入,这块土地上的汉语方言也才有可能开始其由逐步渗透到最终形成的历史。

方言地理学的研究触角往往还可多角度地延伸至现代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因为同时结合曾经广泛分布于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以及不同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研究,往往可以更深层次地触及少数民族接触地区汉语方言的深层背景。黔东南是以苗族、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地区,而以苗语、侗语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千年积淀无疑会在黔东南汉语方言的底层留下深深的历史印记。仅就现代汉语方言调查所采集的数据材料来看,以苗、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集中聚居以及语言影响显然已直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

③ 刘学洙:《贵州沿革与贵州文化》,《贵州日报》2001年3月30日。

接导致了黔东南一西一东两种方言类型的分野,结合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以及不同区域内所属文化的语言接触研究,我们往往可以获得远远超过单纯描写方言学的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民俗记忆、口传历史等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可以弥补史籍文献的不足,结合民、汉多语对比的文化研究甚至还可让我们透过黔东南汉语方言的特色,了解黔东南独特的人文性格以及影响这一性格形成的不同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生态与文化类型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的形成原因,等等。

在我国,“高本汉式”的汉语方言学独领风骚近百年,而“贺登崧式”的方言地理学则被认为非学术传统而遭到长期的冷遇,二者之间的差异除了价值取向外,方法路径以及任务目标也大不一样。不过,正如南原先生所期望的:“平心而论,高本汉和贺登崧都各自手握着真理的一面,贺氏被冷落这么多年确是不公平的。不过,从传统语文学中崛起的中国现代语言学,需要先有高本汉式的、从整体角度发出的‘第一推动’,然后才能进行贺登崧式的分头整理,这也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①殊途同归,本课题的实践体会也大致如此。我们的前期工作就曾严格按照我国传统方言学的方法路径来操作,今天看来,包括以广韵为参照的历时观照和以书面问卷为导向的方法路径以及所获宏观层面的认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以新理论、新方法以及所获新材料来推动的研究的与时俱进,方言地理学的方法实践显然又让我们得以通过完全不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汉语方言的共时现状以及历时发展。两相比较,这后一阶段的研究至少已在这样两个层面推动了研究的深入:第一,调查选点数量的扩大使我们更多地获得了“活的语言的实地调查”数据。我国传统的方言调查一般以县市为单位标准,而方言地理学方言地图绘制的基础要求使我们进一步将调查的选点扩大到了乡镇一级,因此前期的16县市选点数一下就扩大到了后期任务目标的206个。第一手材料的极大丰富显然使我们对于黔东南方言有了更多的直观认识。第二,由地方史乃至民俗学入手的方言地图阐释的任务要求,使我们接触了远超语言学范畴以外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其结果显然就是传统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两种观察视角的互为支撑,多视野研究的突破显然就使我们对于黔东南汉语方言的认识也多层面地深化了。

当然,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以及新、老两种理论方法的结合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全新的课题,我们课题完成的过程实际就是在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其中的挑战显而易见。首先,按照方言地理学尽可能“穷尽式”的调查要求,我们还有距离,虽然这是人力条件制约的结果,但以乡镇为单位的选点显然距离进村入户的理想境界还差得很远。第二,民族自治地区,尤其像黔东南这类“古苗疆”腹地且经历开发时期很晚,苗族、侗族历史上都无文字,因此诸如碑文、铭刻乃至地方史之类的文献资料常常阙如的地区,我们的“溯源性”研究显然距离理想的要求也差得很远。第三,兼用两种方法所获结论可能比较简单,但将两套理论方法融为一体,或至少是在互为交叉综合应用的能力上,我们显然还很欠缺,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挂一漏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当然,亦步亦趋,勉力而行,我们也一路走过来了。好在我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次远行,包括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内的众

① 南原:《贺登崧著〈汉语方言地理学〉》,《方言》2004年第3期。

多专家学者的成就都曾经是我们的前导。在此，我们对曾经给了我们多方面启迪的多学科的学界前辈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书中我们曾直接引用了许多著作者的原话，对此我们都尽可能地在注释中做了说明。但还有更多的借鉴过来的思想已融进本书的一般表述中，这类情况涉及者众且无法一一加注，对此我们除了心存感激外，不到之处也只能敬请原谅了。当然，画虎类犬的拙劣处肯定很多，留下的遗憾只有寄希望于方家的斧正以及今后可能的弥补了。

我们承接的这个教育部社科一般项目（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课题，从接受任务至今已历时四年。在前期最艰苦的基础调查阶段，张雄、肖亚丽、李茂林、吴春兰、谢建红、劳醒华、潘冬等学者及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旅游学院的汉语言文学、地理学等专业的一大批学生参与了基础调研工作，我们课题的完成正是建立在这超过 300 份的基础调查数据基础上的。在深入黔东南州各乡镇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黔东南所属州、县民宗局、教育局、地方志办公室、档案局以及各乡镇党委、政府和各地村委会的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协调下，我们还获得了各地共涉及 300 多方言合作人的配合。在此，我们对曾给予我们无私帮助以及付出过辛劳的所有的人表示衷心感谢！

在书稿的撰写阶段，张雄（方言学硕士、讲师）完成了黔东南方言岛“天柱酸汤话”的调查以及专节文稿的撰写工作；肖亚丽（语言学硕士、教授）完成了侗、汉词汇借用影响方面的论文撰写；李茂林（地理学硕士、副教授）参与了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初稿的撰写；谢建红、李金兰、王政、吴春兰等参与书稿的审校及整理工作；课题主持人王贵生（语言学教授）主持调研，并执笔完成了全书其他部分的撰写及全书的统稿；还有部分教师以及学生参与了课题烦琐的事务工作。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学界同仁熊赐新先生百忙之中拨冗审读书稿并提出了一系列尖锐而中肯的意见，这使我们的许多失误及偏颇得以纠正。感谢所有参与了该课题完成的同仁们，希望我们的劳动能对我国的语言文化建设以及黔东南的文化大厦建设做出一些添砖加瓦的贡献。

王贵生

2014 年 10 月于凯里学院

序 一

我国传统语言学成果在大多人的眼里总显得冷冰冰、干巴巴，甚至是望而生畏的，传播便极有限。如朱德熙先生言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①王贵生教授显然力求克服这些缺点：一是研究方言，因为方言本与一个地方的民族风情、社会生活等都有着天然的联系，尤其是对于同处一地、共用一语的乡亲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二是从传统描写方言学延展至方言地理学，使只有国际音标、图表的学问更有温度。

我有幸在黔东南度过一生中青春最热血的时光，在田野里耕耘收获、在车间里加班加点。这是一个远较“文明世界”更为“原生态”的地方，直到清朝雍正以前，这里仍有大片外人很难窥探的“化外生苗”——既无土司，又无流官，交通闭塞，与外界很少接触。当然，此前明初贵州建省，汉文化开始浸透包括黔东南的全省范围。外来移民或从军，或经商，或逃难避祸，将故乡江南、江北的乡音带入贵州。多以口语、俗语、民歌、民谣等形式口耳相传、素乏文献，但在贵州高原的土地上依然生根、发芽，并在长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最终以文化积淀的形式成长为贵州、包括黔东南不同自然区间、不同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各类汉语方言。

王贵生教授从事着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他由今天的现代汉语方言入手，通过自然地理、民族分布、移民历史、行政区划沿革等专题研究，有理有据地引领我们回溯那些已经十分古老、十分遥远的壮阔历史。通过王先生们的努力，我们又得以触摸、体会、享受当地人民的情感和生活。这一独辟蹊径的成果显然填补了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空白，《黔东南方言地理学研究》因此也具有了一种超越纯学术研究、并与黔东南社会现实充分结合的特殊的人文社会价值。

我与贵生先生相识多年，很敬佩他在学术上的笃实与专注，继推出《黔东南方言志》之后，进而向方言地理学拓展后并以《黔东南方言地理学研究》成书，可喜可贺。

社会生活一日千里，贵州语言学界也需要有新气象。期待王先生及我省语言学界的同仁们更加齐心协力，特别是黔东南的朋友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抢救发掘的工作中，为方言学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顾 久

（顾久：原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贵州省文史馆馆长，贵州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资深专家）

^① 朱德熙、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序 二

本书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范围内,以 206 个调查点的实地调查材料作为对象,用传统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展开研究。通过方言调查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挖掘方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历史积淀等背景因素。本书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值得称道:

第一,方法新颖,视角独到。众所周知,由于受学术文化传统、中国国情等因素的制约,方言地理学在我国起步很晚,用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一省或一地方言更是鲜有人问津。本书作者在传统方言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而又能突破传统方言学的拘囿,采用语言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和审视黔东南汉语方言。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出 42 幅方言特征地图,为研究黔东南汉语方言分布的地理类型及宏观考察黔东南汉语方言形成的自然地理背景、历史文化条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新鲜的视角。

第二,布点合理,资料翔实。传统方言学的研究选点一般到县,而要绘制方言特征地图,通过地图直观地展示语言现象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变化,凸显语言变异与地域空间的关系,进而折射语言现象的历史层次,则需要细化调查点。本书作者在前人对黔东南进行语音分区的基础上,采取声调系统的不同作为分区处理的第一标准,兼顾历史沿革,将黔东南方言分为凯里、镇远、黎平、丹寨、黄平五个小片。在此基础上选取了 206 个乡镇单位作为调查点,选点紧凑合理;调查材料则是在传统语音、词汇调查的基础上,遴选了切合黔东南方言口语实际的几十条语音、词汇、语法条目来进行重点调查,使得材料尽可能地反映语言变化的真实状态,有利于透过语言特征及地图来考察语言分布状态的深层原因。

第三,挖掘深入,结论中允。共时的语言空间分布状态是历时的语言要素消长的缩影,寻求语言分布状态的解释就是对语言历史的重建,这是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旨趣所在。本书作者没有把研究停留在方言特征地图的绘制和简单图解上,而是结合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微观入手,宏观着眼,深入挖掘影响黔东南方言形成的自然地理因素、社会发展、历史沿革背景和族群迁移、民族接触条件,从而考察出黔东南方言的地理基本分布类型:东西对立分布型。

总之,从地理学或类型学的角度来研究贵州汉语方言,成果相当有限。本书作者的调查研究使贵州方言的研究出现了可喜苗头,为全省性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材料;同时也为全国范围内的以行政区为调查单位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尤其是山形地势较为复杂,语言接触较为广泛、建置沿革较为频繁的民族聚居地区的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是将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成功运用于汉语方言研究的范例。

涂光禄

2014 年 10 月 18 日

(涂光禄:贵州大学教授,《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主编,贵州省语言学会资深专家)

序 三

凯里学院王贵生教授致力于黔东南方言研究数十年，2007年曾历十年之功完成《黔东南方言志》的著述和出版，这一次的教育部课题则进一步在《黔东南方言地理学研究》的领域内进行拓展，其成绩可喜可贺。该书值得赞许的几点包括：

第一、用力很勤。传统的汉语方言调查以县为代表，黔东南则以十六县市为方言点调查取样即可完成。而该书以乡镇为对象，涉及的方言调查点密密麻麻遍布黔东南境，据介绍，所涉及的乡镇一共有206个，光是路途上的距离可能也要上万公里吧，该课题不辛苦则不能完成。按照李如龙先生的观点，方言研究的最基础功夫就是“调查、调查、再调查”，正是有了长年风餐露宿、孜孜以求致力于田野的不倦跋涉，因此才有了王贵生教授此次的收获。

第二、领域突破。传统的方言学仅以声韵为观察点，该书则在方言地理学的视野内，透过方言调查去看语言背后的形成原因，该书以黔东南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民族分布及语言影响、移民历史及人口结构等专题展开，所涉及的研究显然已不再是单纯语言学的功夫，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学等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拓展，显然使该书取得了与单山方言着眼大不一样的研究成果。

第三、特色鲜明。民族接触及语言融合研究为该书最为突出的特色。通览全书，结合黔东南民族自治地区汉语方言特点因此而涉及的少数民族语言就包括苗语、侗语、水语、瑶语、壮语等。以苗语为例，书中涉及的语音描述并进行了专题讨论的方言点就包括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滇黔方言、滇东北次方言以及黔东南境内的凯里、雷山、丹寨、锦屏、榕江、黎平、黄平等各县市苗话，苗语各土语方言点至少在20个以上。另外，包括侗语在内的壮侗语族相关的语言研究也涉及水语、壮语及布依语等。有了这样全方位的民族接触语言观察，我们显然对黔东南汉语方言的现状认识又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总之，该书为黔东南文化、乃至贵州文化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收获。贵生老师让我给提点意见，综合以上几点，完成一项使命吧。

颜 迈

2014年10月20日

（颜迈：贵州师范学院终身教授、贵州省语言学会资深专家）

凡 例

一、本书内容所涉及的汉语方言以及苗语、侗语等，有关描述均以实地调查的资料为准。

二、本书语音的记音一般采用国际音标标注，为了简略，国际音标一般不用方括号标识（根据文献引用的文字例外）。另外，引用文献中的苗语、侗语等也有苗文、侗文等专用拼音出现，必要时加注说明。

三、声调一般采用两种方式标注：

1. 在涉及“~~话”，也即具体到某一点的语音时，采用调值标注的方法，右角上标。

2. 在涉及“~~方言”，也即一个广义的方言区，其内部口音比较复杂的时候，采用调类标注的方法，以右角上标 1、2、3、4、5 表示阴、阳、上、去、入等声调。

四、书中涉及我国传统纪年的地方，其后用括弧加注公元所属的年代，为节省篇幅，括弧内一般不用“公元”二字。

五、全书采用电脑打印的简体规范汉字。无法用电脑输出的特色方言字，记录的办法包括：

1. 选用经过考证的音义相符的古字标记：如“酢 tsa³”等；

2. 改用简化的办法处理：如“舞阳河”的“舞”字本来应加三点水偏旁，但所用电脑中没有这一专用字，故而全书改为“舞阳河”。

3. 书中电脑无法输出的古字、俗字等，一般行文用“□”后加国际音标的办法标注，如方言义为“烫”的“□lai⁴”。

4. 引用文献中出现的古字、俗字等，为了不增加印刷的困难，本书采用形旁加意旁，即“~+~”的办法进行说明。例如方言意为“烫”的“□lai⁴”字，《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有三点水旁和火字旁两种异体字，三点水旁可以输出的字为“灏”，但火旁无字，因此便以“火+赖”的写法来加以说明。

目 录

第一章 方言与黔东南方言研究综述 /1

- 第一节 方言地理学与汉语方言地理学 /1
- 第二节 黔东南方言分区的研究与发展 /3
- 第三节 黔东南方言地理学调查实施方案 /5
- 第四节 黔东南方言的调查方案及数据采集 /7

第二章 黔东南方言形成的自然地理背景 /12

- 第一节 黔东南的山形地势 /12
- 第二节 黔东南的河流以及流域环境 /15
- 第三节 自然地理背景下的黔东南方言现状调查 /19
- 第四节 方言地图选录及图解 /26

第三章 黔东南东部、西部方言分区研究 /49

- 第一节 黔东南东、西方言的分区及其背景简介 /49
- 第二节 民族分布与黔东南东部、西部方言分区的形成 /56
 - 专题讨论一：侗、汉合力的形成与东部方言势力范围的扩张 /58
 - 专题讨论二：苗语势力范围的退守与西部方言区的形成 /60
- 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以及语言影响的其他问题 /64
- 第三节 历代移民对黔东南东部、西部方言分区形成的影响 /65
 - 附：黔东南史志中各县市人口、民族资料汇编 /71
- 第四节 黔东南东部、西部方言分区的语音特征研究 /83
 - 专题讨论一：黔东南东部方言区与侗语的底层影响 /85
 - 专题讨论二：黔东南西部方言区与苗语底层的影响 /94
- 第五节 方言地图选录及图解 /101

第四章 黔东南方言的历史沿革背景 /113

- 第一节 我国历史上的“边疆” /113
- 第二节 南宋后期至元代之间开始涉及黔东南开发的早期历史 /116
- 第三节 明代黔东南的历史沿革 /121
- 第四节 清代黔东南的历史沿革 /127
- 第五节 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黔东南的历史沿革 /136
- 第六节 方言地图选录及图解 /141

第五章 黔东南方言分区研究 /166

第一节 黔东南方言小片划分的思考 /166

第二节 镇远方言 /169

第三节 黎平方言 /178

 专题讨论一：明清黎平府北片方言研究 /184

 专题讨论二：明清黎平府南片方言研究 /194

第四节 黄平方言 /203

第五节 凯里方言 /209

第六节 丹寨方言 /217

第七节 黔东南方言岛——酸汤话 /224

第八节 方言地图选录及图解 /230

附录一 文献摘录 /246

附录二 方言调查合作人信息统计表 /269

附录三 参考文献 /274

基础图彩页 /275

插图目录

第一章

基础图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简图 (彩图) /277

基础图 2: 黔东南方言调查定点示意图 (彩图) /278

第二章

基础图 3: 黔东南山势水系图 (彩图) /279

方言图 1. 泥、来二母相混与否 /38

方言图 2. 撮口呼韵母介音异读 /39

方言图 3. 老头、老人家 /40

方言图 4. 乳房 /41

方言图 5. 蜻蜓 /42

方言图 6. 公狗 /43

方言图 7. 蹲 /44

方言图 8. 回家 /45

方言图 9. 去 /46

方言图 10. 告诉 (他) /47

方言图 11. 一向 /48

第三章

基础图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聚居分布略图 /57

方言图 12: 黔东南东部、西部方言分区示意图 /51

方言图 13: f 声母的声韵配合能力 /91

方言图 14: 咸、山摄阳声韵韵尾的丢失与否 /92

方言图 15. u 拼齿音、舌音变读 əu /107

方言图 16. 蜘蛛 /108

方言图 17. 摔倒 /109

方言图 18. 吃 /110

方言图 19. (挑) 水 /111

方言图 20. 全部 /112

第四章

基础图 5: 元代(前)至元年间黔东南简图 /118

基础图 6: 明代永乐年间黔东南简图 /122

基础图 7: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黔东南简图 /129

基础图 8: 民国时期黔东南所属地区简图 /138

基础图 9: 1953 年镇远专区简图 /139

方言图 21. 西红柿 /154

方言图 22. 甘蔗 /155

方言图 23. 果核 /156

方言图 24. 红薯 /157

方言图 25. 螃蟹 /158

方言图 26. (解)大便 /159

方言图 27. 扭(脸) /160

方言图 28. 做(菜) /161

方言图 29. 搅(饭) /162

方言图 30. 开水、濑水 /163

方言图 31. 这样 /164

方言图 32. 很(程度副词) /165

第五章

基础图 10: 黔东南方言分区示意图 /170

基础图 11: 锦屏县汉语方言分区示意图 /185

基础图 12: 锦屏县苗语、侗语分布示意图 /187

基础图 13: 贵州省民族分布略图 /198

基础图 14: 天柱县酸汤话分布地区示意图 /225

方言图 33. 否定副词“不、没有” /236

方言图 34. 合口呼韵介音脱落 /237

方言图 35. 祖母 /238

方言图 36. 古山摄分开合与否 /239

方言图 37. 古牙音遗存 /240

方言图 38. 古入声的分流 /241

方言图 39. 姑娘 /242

方言图 40. 调皮、顽皮 /243

方言图 41. 晒(向)太阳 /244

方言图 42. 什么时候 /245

第一章 方言与黔东南方言研究综述

第一节 方言地理学与汉语方言地理学

方言，通俗的表达指各种地方话，语言学的表达为一种语言的各种地域变体。按照语言学的专业分类，传统方言学一般又可分为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方言地理学三类。描写方言学侧重于对具体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做系统的描述；历史方言学则主要通过对方言的比较来进行一种语言形式和发展历程的研究；方言地理学则着重在方言地图绘制的基础上，展开各方言间复杂关系的描述，其中重要的是对其形成原因和历史发展的研究。严格地说，方言地理学的内涵当中，方言地图绘制的工作要求同时也包含了方言描写以及历史形成研究的任务，因此西方通行的现代方言学就是指以方言地图的绘制和解释为基本任务的方言地理学。这与我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最终形成的方言学研究传统大不相同。

我国现代意义的方言学形成较晚，但以字音为主，遵循《切韵》体系，以古今字音演变对照来显示方言层次的特殊文化背景，最终导致我国形成了以描写方言学为主的学术传统，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路子。在我国现代汉语方言学发展的研究当中，大多学者均将源头指向了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民间歌谣采集的工作，这项田野实录特征明显的工作使方言方音的记录和方言词汇的解释任务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其后就有了林语堂《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1923年）一文的发表，他对“考求声音递变的真相”和“观察方言畛域现象”两个目标的提出，实际就是在借鉴了欧美方言地理学实践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汉语方言地理学发展方向提出的总体设计。他反对仅拘泥于语音的“死描写”，就是根据西方方言地理学需“描写此种各类音是如何变化而来”理论的一种有感而发。由其倡导的“言语地理学（Sprachgeographie）”后来又转化为1924年北大方言调查会《成立宣言书》归纳的七项工作任务。与林语堂一脉相承的是，1925年留法回国的刘复同样提出了“方言地图”绘编的目标，他同样也批评“中国的音韵学，如果不改变方针，向方言中去研究，却只向古书堆中去乱钻，恐怕是无论如何用功夫，结果总不能十分完满的。”（1925）也许是我国文化传统的惯性太大，方言地理学作为一种舶来品最终并未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正如项梦冰等（2005）所言：“可能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件事并未开花结果”，^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以古音为切入点”为参照坐标的描写方言学的学术传统。

方言的地域差异性障碍从来都是文化交流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我国自古就有针对

① 项梦冰、曹晖编《汉语方言地理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方言差异的研究传统。孔子周游列国，亲身的经历使他成了倡导“雅言”的代表，我国古代文献中方言歧音歧义可能影响文意理解的讨论也屡屡出现，西汉末年杨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则是这类研究的集大成者，这不仅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的词汇调查汇编。当然，现代意义上的方言地理学发源于欧洲。最早有德国语言学家温克尔（Georg Wenker）根据“语音演变没有例外”的假说，就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的界线具体展开调查，并于 1881 年绘制了共 6 张的一组方言地图。1902 年，瑞士人吉耶龙（Jules Gilli ron）主持的法国方言地图集出版，至 1910 年共完成了全部 13 册的出版任务。此后，这一理论方法又影响到了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但在中国完成方言地理调查并有专著传世的却是一位外国人。1941—1848 年间，一位中文名叫贺登崧的比利时神父（W.A.Grootaers）完成了他对我国山西大同宣化地区方言的调查任务，最后他在自己所撰四篇论文基础上整理结集的专著就叫《汉语方言地理学》。他在这本书里为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做了如下四点的扼要规定：

一、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及语言片段，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记录下其发音。

二、每个调查项目制作成一张地图，这时，对语言资料不做任何修改，以实际记录到的形式表示出来。

三、把词及其所指对象联系起来，也就是要研究词汇中所反映出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

四、对地图进行解释，为语言（方言）间作比较、为语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由此，确定语言的和文化的地理界限，进而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

贺氏的著述似乎从一开始就有“建设一个摆脱传统文献学的羁绊，以生物学和地质学为样板的历史语言学”的立场倾向，因此他批评与自己所持方法相对立，但最终影响了中国近代方言研究传统的瑞典人高本汉的调查方法：“这不是方言学，而是已为日叶龙的研究结果所全面否定的旧词源学的方法。”^①但是，“可惜‘生不逢时’，贺氏理论孤掌难鸣。1948 年，贺氏在中国工作了 10 年之后黯然离去，虽说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中继续得到使用，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语言学却从此复归沉寂。”

“除了 20 世纪 40 年代贺登崧的开创性研究以外，中国地理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种状况与地理语言学的学科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我国缺乏地理语言学的学术传统以外，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就是汉语方言分布区域极为广阔，方言差异极为悬殊，进行全面调查的难度与欧美国家不可同日而语。”^②

虽然作为一门学科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方言地图的绘制以及研究工作却仍在我国得到应用，尤其是在上一世纪 90 年代之后，最为宏大的工程莫过于《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出版。本书就是希望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范围内，以 206 个调查点的实地调查材料作为对象，借鉴方言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展开相关研究。

《基础图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简图》（见书末彩页）。

① 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作者日译本序[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8 页。

② 曹志耘·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 research 展望[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1、4 页。